

小舟山的山

吴立南

小舟山在瓯江北岸,青田与永嘉交界处。农历二月,春暖花开,天地清明。从温溪镇的北侧上山,崎岖的公路一直在山的一侧来回折腾。山是单面的,峻峭的,如一张悬挂在空中褶皱的彩布。车子保持着盘绕的状态,没有爬上一条山梁,越过一个山坳,前面豁然开朗的感觉,而始终是贴着后山,一半着地,一半凌空的惊恐。山越来越低,天越来越空。眼前虚无,没有山的阻挡,我们若在腾云驾雾。

天空湛蓝,空旷无云。我们到大尖山已经是中午。虽然山风还带着冬天的清凉,但是仲春的阳光晒在身上,已经感觉到夏天的躁热。

大尖山在小舟山之上,海拔700多米,像江面上突兀的桅杆,撑开一面壁立的风帆,把人顶上了云端。云端不是云,是云彩般的梯田,是梯田里的金黄色的油菜花,是山坡上绿郁郁的油茶树,是山顶上的斑斓多彩的猴头杜鹃花。

人在观景台上,400多米断崖式的地峡,一落千丈,峭拔,深邃,凌空而起,带着春天的冲动,有种飞的感觉。

村庄生在彩布的褶皱里。咖啡馆搭建在毛竹林里。我们下榻大尖山之上,一处与星光最接近的地方,叫“尖山云庄”。古色古香的四合院。它如一朵云,依泊在断崖之上,大尖山西侧的山坳里。

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创意。那种睡在天上的感觉。

山庄的夜真静,静到你不敢大声说话,静到你心里懒得想事。也不是这屋里静,而是整个宇宙万籁俱寂。没有风声,没有虫鸣,我们只要用眼睛看,用心灵感受。我们可以看到山底下万家灯火,看到火龙飞腾的盘山公路。我们可以看到窗前悬挂着的银盘般的圆月,看到闪亮的星星从我们的梦里滑过。

凌晨醒来,窗外响起了喃喃嗒嗒的雨声,那是檐口的雨水打在了地上发出的声响。那是来自我家乡一种熟悉的带着温度的声音。我似乎闻到灶间的烟火味了。雨滴从疏到密,然后连成一片,混合成一曲模糊的晨曲。我似睡非睡,那么慵懒地躺在床上。

晨光透进房间,也带进了零星的鸟鸣声。没有阳光。

雨住了,窗外都是白蒙蒙的雾,整团地裹住了山,围住了山庄。打开房门,院子里的雾淡淡的,她从瓦背上滑下来,如展翅的白鹭钻进了房间。我们走出山庄,雾又退出一块空地。我们走到哪里,雾就退到哪里。脚踩着雾,手抓着雾,鼻子呼吸着雾。只要你走出几步,雾就把你的身影变得模糊起来。我们在雾中拍照,形象完全失真,跟昨天判若两样。

一切都隐在雾里:峡谷,断崖,台地,山尖,梯田,山村;险峻,色彩,躁热,文学。空气里飘逸着一种柔和的思绪。大家在大树底下不断地组合摆拍,拍出上世纪六十年代、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的记忆来。

雾退去的时候,站在山尖上应该看到广阔无垠的东海。原计划上午攀登大尖山的主峰,但是,我们放弃了。

我想,她像插在小舟山上的一面旗帜。

我的高中生物老师孙森荣先生

陈秀雄

去年11月10日,我在与担任青田中学校长的邓加富同学通话时,请他代向孙老师致意。当时我与王兵的新闻正在我的老家青田泛起一片涟漪。孙老师一向关心我们的成长,他如果知道,多半会感到欣慰的,所以希望老邓转告一下。老邓当时的反应很奇怪。他问:“哪个孙老师?”

我非常诧异,憋了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还有哪个孙老师,不就是我们的孙老师吗?我心里一个劲地腹诽我们的邓校:当校长时间长了,贵人多忘啊。

孙老师是我们高中的生物老师。他讲课绘声绘色,形象生动,教室的气氛很活跃。印象很深的是他经常带各种用硬纸板做底的彩色图画,上面有各种植物、动物、人体器官的彩图。跟其他课相比,当时挺“标新立异”的。高高的个子,浓重的乐清口音,上课时总喜欢站在讲台下,头微向后仰,双手经常用力挥舞来加重语气。他对生物这个学科的理解、热爱,他那种恨不得马上教会我们生物知识的迫切,毫无遮拦地流溢在外。将近40年了,孙老师讲课的情景,在我脑中还是历历在目。难怪当时有不少同学梦想成为一名生物学家呢。在那个“数理化横行天下”的年代,确也是一个异数!

我们那一届很幸运,老师们都是一时之选。比如,很受我们尊敬的吕小大老师(语文)、熊松仙老师(数学)和周建环老师(化学)等。但论起在学生中的亲和度,孙老师是唯一的。既是老师,也是邻家阿伯,亲切而温暖。他退休后在青田龙东小区的房子里经常有同学三五结伴去他家,可谓高朋满座,内子与我也去过好几次。房子在11楼,一进门就是一个小客厅。右边是起居室,左手边靠窗是一个长沙发,沙发左边则是厨房和小书房。正对着门,沙发右面和沙发垂直的地方,靠墙摆着几把椅子。一般我们几个挤坐在沙发上,孙老师就坐在我们右手边的椅子上。师母通常用高脚玻璃杯给我们泡绿茶喝。茶水烫,她放在茶几上,嘱我们晾了再喝,然后自然就退回起居室,让我们师生自在聊天。孙老师还像上课一样热情,整个

身子倾斜过来,迫不及待地让我们看他的相册。里面有他子女的,尤其是孙子辈的,还有他教过的学生们不同阶段的照片。我其实只要坐在那里,时不时点点头发出几声“嗯嗯”就好。孙老就会滔滔不绝,绘声绘色,给我们介绍他的孙子辈,他的学生们,谁谁谁怎么啦,谁谁谁又怎么啦。每次我都很感动,羡慕。我面前的这个老人,幸福满满,眼中满是慈祥,话里透着爱意。

“是孙森荣老师吗?”老邓问,不等我回答,他又接着说,“孙老10月30日已经离世。”

“怎么可能?”我不敢相信,头脑一片空白,视线已经模糊,整个人被莫名的伤感侵袭。我完全没有心情聊下去,就问了一些必须问的问题,也忘了最后是怎么结束的。

就在2019年的7月,我还接到孙老师的电话。电话里他很兴奋地说:“我是孙森荣,森荣哪。”声音一如继往地洪亮。

“唉,孙老师好。”“现在青田到处在传你的消息呢。他们找我,说这个人老厉害了。还问我你知道吗?我一看……”他喘了口气,接着说,“我一看就说,这不就是我的学生吗?”然后一直哈哈地笑。那种长辈为小辈取了一点点小成绩而打心底里地满意自豪,虽相隔千万里,我也能清晰地感受到。

后来我明白,当我被入选为2019年度的西蒙斯学者,消息不径传到老家。老家自然是偏爱我的,青田是一个小地方,一点“小事”就成了“大事”,于是就有了前面的电话。不过孙老师就是这样的人,他很在意关注他的学生们。近40年来,都是如此。我们的每一点小进步,他都比我们自己还兴奋雀跃。我知道好几个同学对这都有亲身体会。近年来每个夏天都回国,一回到老家总要到孙老师家坐坐。今年苦于疫情没有回国,而那次与孙老师的通话竟成了我们的永别。

回想与孙老师的点点滴滴,他确是一个长者,对我们晚辈关怀备至,没有一般老师的矜持或者架子。记得就是最近的一个夏

天,应该是2018年的8月初。我们住在青田开元酒店里,南方山区的天气,又潮又热。我们给他打电话约了晚饭后去他家看他,并告诉他我们下午出去办点事。他很爽朗地说,好好好,你们年轻人自己先忙,我们一会儿见。我们都没在意,就等着晚上去拜见他老人家。万万没想到,等我们从外面办事回来,大约四五点左右,孙老师已经在大厅里等了,也不知道他已等了多久。开元酒店大厅的皮沙发很低,孙老师个子高,挣扎了一下撑着手才站起来,旁边放了一大篮水果。他乐呵呵地说,天气热,给你们拿点水果解解暑。内子和我真的很不好意思,赶忙说,怎么好意思,您是长者,应该是我们拿礼物去看您,却让您这么远过来,还拿这么多水果。他说,没事,没事,你们买东西不方便,我就顺便过来了,多走走对我身体也好。90岁的老人,身体是真的硬朗!他这一“顺便”起码是十几分钟的路程。大热天提着一大篮子水果,我们真的好感动,当然也羡慕他的健康。我们一起聊了一段时间,然后他就起来走了。我们想送他回去,毕竟是90岁的人了。他坚决不让,说路很熟,我们拗不过他,只好算了。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人,处处替我们着想,还照顾我们的感受。

说起礼物,最近徐一平同学亲口跟我们讲了一件他经历的事。徐同学也是与孙老师多年交往密切。有一次他弄到些1985年的普洱茶,很自然就拿了一小罐给孙老师,孙老当面收下了,没有驳他的面子。但第二天又送回来了,找了一个很科学的解释说,老年人喝这个不好。孙老是生物老师且在老年大学里教养生,说起来还真是权威。一平说:“其实我知道,他就是不想收学生的礼物,但又怕我尴尬,就找了个让人没话说的理由还回来。”听了老徐这个故事,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,幸好不是当面说,他看不见。不能收学生的礼物,这个道理我懂,但我貌似收了老师的礼!为这事,我们俩在电话里很是感慨了一番。

孙老师就是这样律己宽人。我最近才知道,他九岁丧父,由寡母含辛茹苦抚养成人,大学毕业后加入浙南游击纵队。反右时蒙冤被诬为“反革命分子”,后又被“发配”到乡下直到文革结束。平反后对那些整过他的人,他却选择了原谅,待之以礼。因着我有至亲在文革中遭遇不堪,可谓积怨也深,其恨也切。我深深地知道,在情感上放过整过自己的人,是多么地艰难!恕道难,难在宽恕自我!他真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,冤重似山的人生之路造就的却是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。因着放下悲情,在家他能从容享受亲情,在校他能真心帮助年轻老师。对于他的门生故旧,孙老师是戴目倾耳者,出谋划策者;是黑暗里划亮火柴的人,是寒冬里带去温暖的人;他那里是风暴中可停泊安歇的港湾,是失利时可重振旗鼓的后方。他用一生守护甚至宠溺着他的晚辈们,在他的晚年,他也因此被晚辈们对他的爱戴包围着。

今天,我在这里写文纪念我的学行之师(北师大校训:学为人师,行为世范),忘年之好。他永远地走了,没有文字可以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悲伤和怀念。孙老师这一代人,是我们这个多难民族的见证人,他们的苦难,他们对恶劣环境的卑微挣扎,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。而正是他屡遭不公和事后的放下,闪耀着人性的光辉。所以我在这里,是纪念,更是感恩。悲他的离去,感恩他的人性光芒。愿我们这片土地上,不再有背弃,阴暗和寒冷。愿宽恕,爱和守护,像阳光一样,洒遍我们每一个角落。

赚来一天 丢掉一小时

丁子洋

在岗时,虽也有几次赴美考察的机会,却又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,我是退休那年才自费第一次去美国的,主要目的还是去当“奶爸”。

以前几次出境均往西或南行,时差往后,感觉时间变慢一点,晚一点睡觉而已,感受不深。2017年3月9日11:40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,乘坐达美航空起飞,在日本成田机场转机一个半小时,换乘后再飞行9个小时,在途时间约13个小时,到达美国西部波特兰机场时当地时间还是3月9日9:45(北京时间与美国西部时差16个小时),但对我而言已是昼夜颠倒了。

也就是说,当我搭机向东飞越太平洋一万多公里,13个小时后,还提前了两小时回到出发时间的原点时间前面。需要再过一次3月9日,足足赚了一天还多两小时!真是一次奇妙的穿越时空旅行。

这是什么原因呢?学过地理的就会知道,其实这就是国际日期变更线给你的错觉,并不是谁真有那么大本事可以穿越时空。

什么是国际日期变更线呢?原来,为了避免日期上的混乱,1884年国际经度会议规定了一条

国际日期变更线。这条变更线位于太平洋中的180°经线上,作为地球上“今天”和“昨天”的分界线,因此称为“国际日期变更线”,又叫“人为日界线”。按照规定,凡越过这条变更线时,日期都要发生变化:从东向西越过这条界线时,日期要加一天,从西向东越过这条界线时,日期要减去一天。这种现象当你在环球旅行中会出现,就是可能是在旅行中多出一天,或者在旅行中丢掉一天。具体说是当你向东旅行跨过国际日期变更线时会多出一天,向西旅行跨过国际日期变更线时会少掉一天。

我的这次旅行多出了一天,便是在向东旅行又跨过了国际日期变更线而出现的。这样,我奇妙地在飞机落地后重新开始过3月9日9:45以后的时间。

这种感觉怪怪的,“时不再来”失灵了。如果我住在这里不动,那么我就把赚来的这一天放心大胆地用完,不用归还的。但其实是,当我从美国返回时,这一天又失去了,归还了,还是回到原来的时间。即你会在返回在空中时需要加上16个小时,一计算,平白无故地增加了一天,从长远来看,你去美国时和回来时,这一天既没多起来,也没失去,还是那个时间。

我们的祖先神话有“天上一日,地上一年”之说,后来又说是科学道理,时间在超光速行进中会被扭曲。我是文科生,对于这类时间扭曲之说,听不太懂,更不懂这原理。但是,在我毫无知觉中飞越了人为的“国际日期变更线”后返回出发前时间是真真切切的,也就是我说的赚来了一天。如果你有记日记的习惯,那么你的此行会出现两个同一天的记录。

此行的奇妙还不止于此,我还丢失了一个小时,而且我大概是不能补回来的,失去便失去了。

那是我到波特兰后的3月12日早上,我的手机由网络自动把时间调到了当地的夏令时,而我浑然无知。我怀疑手机出问题了,还准备找原因,问了儿子后才明白,是美国都在实行的每年3月第二个星期天由标准时间改为夏令时(把标准时间往前拨一个小时),就是这个夏令时让我丢失了一个小时。

原来美国国会通过的能源法案规定,为充分利用日光,节约能源,实行夏令时。是一种为节约能源而人为规定地方时间的制度,在这一制度实行期间所采用的统一时间称为“夏令时间”。一般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为将时间提前一小时,可

以使人早起早睡,减少照明量,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,从而节约照明用电。目前全世界有近110个国家每年要实行夏令时。美国夏令时从3月第二个周日持续到11月第一个周日,据说之所以安排在周日,是为了便于生活的调整不至于受到较大的影响。

我到美国后碰到了这个制度的实行,被减少了一个小时,也就是丢失了一个小时。

因为按照规定,我不可能在这里待到11月恢复实行冬令时,所以我的这一个小时在这里也将永远丢失了。而我赚来的3月9日这一天,随着我回到中国,向西行跨过国际日期变更线,赚来的这一天便要归还的,加上一天,也即失去一天,与原来在中国一样,用北京时间,找补平衡。

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。

